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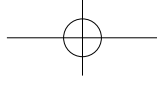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婚暴併兒虐發生率之初探—以南投縣為例

沈瓊桃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檢視台灣婚姻暴力併兒童虐待的發生率，以及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設計是以橫斷性的量化研究為主，運用問卷作為資料收集的測量工具，以普查的方式，針對208個南投縣家暴中心所受理之通報事件之案家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分成父母版以及子女版兩種版本，分別由一位父母及其一位子女填答。問卷的主要內容是衝突策略量表婚暴版(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簡稱為CTS2)與衝突策略量表兒虐版(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簡稱為CTSPC)。**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有顯著的關係，一年內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合併發生率高達65.2% (包括精神、肢體暴力等各種傷害形式)；四成(39.6%)的家庭同時有夫妻與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另有超過1/4的家庭(26.2%)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此外，「曾經發生過」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更高達84.1%；並且有將近半數的家庭「曾經」發生嚴重肢體暴力的婚暴併兒虐的情形。**研究結論：**研究結果突顯出婚暴併兒虐現象的嚴重性，極需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與努力。

關鍵詞：家庭暴力、婚姻暴力、兒童虐待、婚暴併兒虐

沈瓊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工作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家庭暴力相關議題之探討，以及婚姻與家庭關係的測量與量表之發展。(E-mail: acshen@ntu.edu.tw)
收稿：2005年07月29日；接受：2005年11月0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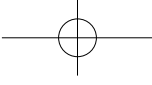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長久以來，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議題有如兩條平行的軌道，不論在政策面、學術界或是實務界，兩者通常是被分開檢驗與處遇的領域(Appel & Holden, 1998; Edleson, 1999; 丁雁琪, 1999; 林淑娥, 2000)。然而近三十年來，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國外研究指出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在同一家庭中合併存在的事實(Appel & Holden, 1998; Edleson, 1999)。在暴力家庭中，婚暴與兒虐的合併發生率(co-occurrence rate)平均約在40%左右(Appel & Holden, 1998)。也就是說，當家庭出現某一種形式的暴力時(如婚暴)，就非常可能出現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如兒虐)。並且，家暴的受害者除了當事人之外，更可能波及到無辜的其他家人。例如，根據美國一項調查顯示，當家庭中發生婚姻暴力時，兒童受到身體虐待與疏忽的比例是全國兒童受虐比例平均數的15倍(Senate Hearing 101-939, 1990)。學者(Carter, 1998; Swinford, DeMaris, Cernkovich, & Giordano, 2000)更指出婚姻暴力、兒童虐待、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三者之間的關連性，意即在家庭暴力中成長的兒童，到了青少年時期，比起一般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產生暴力行為；到了成年時期，亦更可能成為婚姻暴力的加害者。因此，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成了孕育暴力青少年與婚暴加害者的溫床。如果能重視婚暴併兒虐的現象，早期發現，早期介入和處遇，就有機會預防家庭暴力一再的發生，並能保護所有家暴受害成員的安全與福祉。

反觀國內，雖然實務界認為婚暴併兒虐的存在有其普遍性，但卻少有實證研究直接針對此現象加以探討(林淑娥, 2000)。且在社政體系中，家暴防治與保護工作多未以家庭為服務單位，致使實務工作經常呈現各為其主(例如婦女或兒童)的不協調甚至於衝突的狀態，而無法將家中所有的受害成員整合於家暴服務的安全保護傘之下(林淑娥, 2000; 黃富源、黃翠紋, 2000; 馬宗潔、鍾宜利, 2003)。

由於目前國內有關婚暴併兒虐現象的實證研究可說是有如鳳毛麟角，極需學術界與實務界加以重視，以增進對暴力問題整體性的了解，並能以家庭所有成員的安全與福祉為考量，終止暴力在家庭中的擴散。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並進一步檢視婚暴與兒虐是否有顯著的關係。



二、文獻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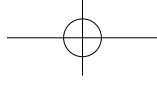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目前國內外針對婚暴併兒虐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國外的研究最早是從1975年開始，才有學者發表關於此項議題的研究報告(Moore, 1975)，累積至現在約有40篇左右的文獻探討家庭中婚暴併兒虐的重疊現象(overlap)。而台灣至目前為止，只有4篇相關的研究報告(黃志中，1999；林淑娥，2000；馬宗潔、鍾宜利，2003；沈瓊桃，2005)，其餘則是部份相關的論述(例如周月清，1996；黃富源、黃翠紋，2000)，或是在探討婚暴對目睹兒童的影響時，將目睹兒童的定義擴及至因婚暴而經驗到虐待的兒童(沈慶鴻，2001；陳怡如，2003)。以下分別就國內外的研究文獻作說明與評述：

(一) 國外的研究情況

國外的研究情況分成兩個部份陳述：首先探討婚暴併兒虐的相關理論，再者分析婚暴併兒虐發生率的相關研究。

1. 理論基礎

Appel & Holden (1998)認為有五種理論特別適用於解釋婚暴併兒虐的關係與起因，包括：社會認知理論、發展一生態理論、反社會人格、人類行為基因論、與家庭系統理論。社會認知(學習)理論(Bandura, 1977, 1989)認為暴力是從原生家庭學習而來。兒童透過觀察模仿與合理化，學習複製他們所經歷的行為模式，長大之後成為婚暴與兒虐的加害者。受虐婦女亦從施暴配偶身上學習到以暴力的方式處理親子衝突。發展一生態理論(e.g., Bronfenbrenner, 1989)認為當外在環境壓力甚大(例如失業)，而又缺乏保護因子(例如社會支持系統)的緩衝之下，可能會引起加害者對自己的配偶與小孩施暴的反應。也就是說，壓力過大的人會使用暴力來因應壓力。因此，壓力大的人會毆打配偶，而受虐的配偶會毆打子女。反社會人格理論(Simons, Wu, Johnson, & Conger, 1995)認為，如果加害者有反社會性人格的話，他/她就很可能會虐待配偶，同時也會虐待小孩。至於造成反社會人格的原因可能包括嚴厲的父母管教與負面的教養方式。人類行為基因論認為有反社會性基因遺傳的人會虐待配



偶，同時也會虐待小孩。家庭系統理論(Minuchin, 1985)從家庭系統之次系統間相互聯結觀點，認為當婚姻暴力衝突發生，孩子可能會扮演親職角色、或成為代罪羔羊、或與雙親其中一方來對抗另一方(跨世代聯盟)，因而增加兒童受到波及與虐待的風險(Kerr & Bowen, 1988; 曾慶玲、周麗端，1999；翁毓秀、莊靜宜，2003)。

上述五種理論觀點對於婚暴併兒虐的關係與起因各有其不同的見解。由於甚少相關文獻是以檢驗理論為研究目的，故尚缺乏充分的數據來評估這些理論對婚暴併兒虐現象的效度與解釋度，仍有待後續的研究檢驗之(Appel & Holden, 1998)。雖然本研究之目的並非在探討婚暴併兒虐的起因，所收集之資料亦無法用來檢驗比較各理論，但綜觀上述理論可以歸納出，婚暴併兒虐的現象可能是受到個人生理心理、家庭互動、或是社會環境等因素所影響。不管起因為何，上述理論皆說明了婚暴併兒虐現象的可能性與存在性，而這也是本文之所以檢視在台灣的家庭中，婚暴與兒虐的發生是否有顯著關係的理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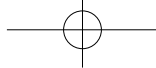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2. 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

國外的研究顯示，在同一個家庭中，有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co-occurrence rate)從5.6%到100%不等，其平均發生率約在40%左右(係指婚暴合併嚴重的兒童肢體虐待，Appel & Holden, 1998)。McGuigan & Pratt (2001)的縱貫性研究發現，在婚暴併兒虐的家庭中，78%的案例是先有婚暴，後有兒虐。

在相關研究中，共有24篇報告提供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百分比(限肢體暴力，因研究其他形式暴力之合併發生率的報告極少)。表一將國外研究的數據作一統整，以顯示出在不同的樣本之下，各項報告所呈現的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的高低範圍與中位數為何(由於各項報告所呈現的合併發生率高低範圍差異頗大，故以中位數而非平均數來呈現各項數據的集中趨勢)。

由表一可看出各項報告所呈現的百分比數據差異性極大，其主要原因在於研究方法的差異，包括：樣本來源、對虐待的定義、資料來源、對虐待期間的界定、以及兒虐的部份是否有針對特定的子女(Appel & Holden, 1998; Edleson, 1999; McGuigan & Pratt, 2001)。以下就五個主要的研究法議題說明其對計算發生率的影響為何：

(1) 樣本來源：婚暴併兒虐發生率的研究對象一般分為三種來源，包括：一般社區



表一：國外研究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一覽表(N = 樣本數)

樣本	百分比中位數	最低百分比	最高百分比	報告篇數
一般社區樣本	11	5.6 (N = 2688)	21 (N = 550)	4 ^{1a}
臨床樣本—受虐婦女	41	11 (N = 76)	100 (N = 50)	15 ^{2b}
臨床樣本—受虐兒童	50	26 (N = 110)	59 (N = 32)	5 ^{3c}

1. ^a Gelles & Straus, 1972(在Hotaling, Straus, and Lincoln, 1990的文獻中提及); Gelles & Straus, 1988; Silvern et al., 1995; Straus et al.,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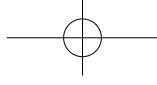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2. ^b Bowker et al., 1988; Giles-Sims, 1985; Hilton, 1992; Holden et al., 1998; Hughes et al., 1989; Jouriles et al., 1987; Jouriles & Norwood, 1995; Kruttschnitt & Dornfeld, 1992; McCloskey, 1997; Moore & Pepler, 1998; O'Keefe, 1995; Stacey & Shupe, 1983; Suh & Abel, 1990; Walker, 1984; Wildin et al, 1991.

3. ^c Carlson, 1991; Folsom et al., 2003; McGuigan & Pratt, 2001; McKibben et al., 1989; Sternberg et al., 1993

樣本、受虐婦女的臨床樣本、以及受虐兒童臨床樣本。社區樣本所計算出來的合併發生率數據較低，中位數約在11%左右；臨床樣本數據高低差異較大，合併發生率可高達100%。

(2) 虐待的定義：相關研究對兒虐的定義不一，對兒虐的定義若較廣義(例如包括推、抓小孩)，則百分比較高；反之，若兒虐的定義較嚴格，則百分比較低。是否有包括精神虐待、性虐待或疏忽，也會導致不同的數據呈現。另外，若是用標準化量表來測量，所得到的百分比較高；若是用父母的自我報告法(例如訪談、自填問卷)，則百分比較低。

(3) 資料來源：有些報告使用多重資料來源(例如不同家庭成員、專業社工的調查評估、正式的個案或醫療紀錄等)並比較其中之異同發現，不同的資料來源所呈現出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有顯著性的差異，意即不同的資料來源所呈現出的資料一致性偏低(McGee, Wolfe, Yuen, Wilson, & Carnochan, 1995)。因此，為了避免單一資料來源的限制與以偏概全，學者多建議使用多重資料來源以收集全面性的資料。Edleson (1999)認為成人與小孩的自我報告，再加上個案紀錄，應是收集正確資料最完善的作法。



(4) 對虐待期間的界定：在計算家中是否有婚暴併兒虐的現象時，約有一半的研究是以“是否曾發生過”為期程，另一半的研究則是計算“過去一年之中是否曾發生過”，計算的期間越長，所得到的百分比越高。

(5) 兒虐的部份是否有針對特定的子女：若是有針對特定的子女做計算(例如父對子、父對女、母對子、母對女)，則合併發生率較低；反之，若只是計算父母有無虐待小孩，而沒有針對特定的子女時，所得到的百分比比較高。

基於上述之文獻檢閱，本研究在分析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時，使用多重資料來源(不同家庭成員)，並同時呈現與比較“曾經發生過”以及“過去一年內”兩個期間的發生率差異，且將虐待的定義分成全部傷害形式(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虐待與疏忽)、肢體暴力、與嚴重肢體暴力等三種，以比較不同研究方法所呈現的合併發生率之差異。

(二) 國內的研究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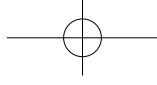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國內探討婚暴與兒虐在同一家庭中合併出現的研究可說是極度缺乏。至目前為止，只有黃志中(1999)、林淑娥(2000)、與沈瓊桃(2005)有統計過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

黃志中(1999)分析高雄醫學院中71位遭身體虐待的門診婦女之臨床調查，發現在這些婦女的家庭中有58.8%合併兒虐問題、78.9%合併目睹兒童。

林淑娥(2000)檢閱台北市家暴中心保護專線，自民國87年1月到88年12月間婚暴及兒虐開案轉介之個案資料中發現，婚暴與兒虐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家庭中有229例，而該段期間共有兒虐新案1370件，婚暴新案有1381件，故合併發生案例佔兒虐新案為16.7%；佔婚暴新案則為16.58%。然而，這只是保守的估計，此比例尚不包括在後續服務中兒保個案紀錄裡，載有母親曾有婚暴情形而未開案者；與後續婦保個案紀錄中載有兒童曾受虐但未開案者，以及更多未曾求助專線的家庭。

沈瓊桃(2005)以632位台北市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社區樣本)，發現有超過十分之一(12.7%)的兒童在家庭生活中曾經看到父母衝突，也曾遭受父母的傷害，兒童目睹婚暴與受父母肢體暴力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r = .45$)。

檢閱國內文獻發現，目前國內非常缺乏針對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合併發生在同



一家庭的實證研究。目前的家庭暴力研究報告多是分別就婚姻暴力、兒童虐待與目睹兒童等三方面之議題進行探討。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兩個領域的學術研究雖頗有成果，但兩者之間卻鮮有交集與連結。因此，究竟台灣的家庭中，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重疊的程度為何，兩者之間是否有顯著的關係，成為一個極需探討的議題。

三、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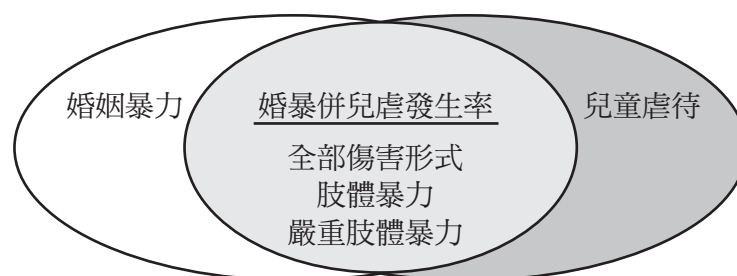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設計是以橫斷性的量化研究為主，使用多重資料來源(夫妻及其子女)，以期對婚暴併兒虐做最深入切實的了解。以下就研究架構、樣本、測量工具、以及資料收集與研究實施程序加以說明。

(一)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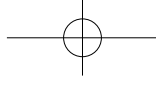
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測量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二是檢驗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關連性。基於上述目的，本文所考驗之研究假設為：「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有顯著的關係」。

圖一呈現的是本研究之架構。研究架構包涵三個研究變項：婚姻暴力、兒童虐待、與婚暴併兒虐發生率。如圖一所示，本研究假設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兩者有重疊(overlap)的關連性，兩者並非獨立事件。此外，本研究測量各種暴力合併形式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以了解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重疊(overlap)的嚴重程度究竟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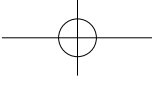
茲將研究架構中的變項概念性定義與操作性定義說明如下：



圖一：研究架構圖



1. 婚姻暴力是指配偶之一方遭受到另一方之身體、精神或性方面的虐待與傷害。其操作性定義是指受訪成人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2中所陳述的婚姻暴力狀況(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暴力與受傷程度)。
2. 兒童虐待是指父母對未滿十八歲的兒童(含青少年)施予身體、精神或性方面的虐待與疏忽，而造成其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其操作性定義是指受訪兒童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PC中所陳述的兒童虐待或疏忽之狀況(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暴力與疏忽)。
3. 婚暴併兒虐：本文將同一家庭中，既有上述婚暴又有兒虐的現象稱之為婚暴併兒虐。基於不同暴力合併形式的發生率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將婚暴併兒虐依不同的暴力形式與嚴重程度，進一步分成三種型態加以分析探討，分別是：全部傷害形式(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虐待與疏忽)、肢體暴力、嚴重肢體暴力等三種婚暴併兒虐的型態。
4. 全部傷害形式合併型態：全部傷害形式所涉及的範圍較廣，不論家庭發生哪一種婚暴或是兒虐的類型，皆算是有發生雙重暴力的家庭。其操作性定義是指受訪成人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2中所陳述的婚姻暴力之狀況(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暴力與受傷程度)，並且，同一家庭之受訪兒童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PC中所陳述的兒童虐待或疏忽之狀況(包括肢體、精神或性方面的暴力與疏忽)。計分方式是：0=非合併型態；1=全部傷害形式合併型態。
5. 肢體暴力合併型態：肢體暴力指的是家庭中，既有夫妻之間、又有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情形產生。其操作性定義是指受訪成人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2中所陳述的肢體暴力之狀況，並且，同一家庭之受訪兒童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PC中所陳述的肢體暴力之狀況。計分方式是：0=非肢體暴力合併型態；1=肢體暴力合併型態。
6. 嚴重肢體暴力合併型態：嚴重肢體暴力則是指夫妻與親子之間皆有嚴重的肢體暴力發生。其操作性定義是指受訪成人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2中所陳述的嚴重肢體暴力之狀況，並且，同一家庭之受訪兒童自填曾遭受一種以上CTSPC中所陳述的極度嚴重肢體暴力之狀況。計分方式是：0=非嚴重肢體暴力合併型態；1=嚴重肢體暴力合併型態。婚暴版中所陳述的嚴重肢體暴力行



為共有七種，包括：對配偶使用刀槍、掐脖子、推去撞牆、故意燒燙傷、毆打、踹、用會讓配偶受傷的東西打他。兒虐版中所陳述的極度嚴重肢體暴力之狀況共有四種，包括：父親或母親不斷地用力毆打、掐脖子、故意將小孩燒燙傷、用刀槍威脅小孩。

(二) 研究樣本

1. 研究母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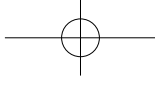
目前國內婚暴與兒虐相關研究的樣本多來自社福資源較豐沛的都會區，然而研究顯示，失業、財務困難、低收入與低社經地位的家庭較易有兒虐的現象發生 (Markowitz, 2001; McGuigan & Pratt, 2001)。南投縣在歷經民國88年的921震災之後，居民的生活及經濟情況比災變前更加弱勢與邊緣化，實是發生家庭暴力的高危險區，因此，本研究以南投縣為研究場域。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南投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暴中心)所受理之家庭暴力通報事件之案主或案家(含受虐配偶及其子女一名，或是受虐兒童及其父母一名)，以普查^a的方式，針對208個家庭進行面訪。樣本選取的標準包括：(1)受虐配偶願意接受面訪者；(2)受虐配偶至少有一位在22歲以下，6歲以上之子女，能接受面訪者。本研究原先設計的子女選樣標準是介於6歲至18歲之間，但因某些家庭的成年子女表達要參與此研究的意願，並且，通報資料與本研究收集資料的時間最多有四年的落差(最早的通報資料是89年1月，最晚的是92年6月)，也就是說，按照當年的通報資料，受訪子女尚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但等到研究訪員聯繫時，子女已超過18歲。為了能讓更多的受暴子女有發聲的機會，故將年齡標準放寬至22歲。

2. 預試樣本

本研究之預試是以南投縣家暴中心自民國88年6月開辦以來，至民國91年12月底所受理之2728件家庭暴力通報事件的案主為母群體，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273戶名單，扣除無效的通報資料之後(包括搬遷、電話或地址有誤、小孩年紀資格不符等)，

^a普查指的是針對所有符合資格且尋找得到的案家進行聯繫。本研究共聯繫上466戶案家，其中有208戶同意參與此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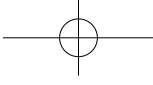
可訪問戶數共有107戶，最後成功完成46戶，成功率為43%。此外，由於預試發現民國88年的通報資料異動特別大(可能是因為921地震的緣故，使戶籍聯絡資訊變更)，故正式收集資料改以民國89年1月至民國92年6月底所受理的家庭暴力通報案件為母群體。在預試抽樣過程中亦發現，可尋找得到且符合研究選樣標準的通報家庭比例並不高，故在正式收集資料時，改用普查的方式而非預試時的隨機抽樣方式。

3. 正式樣本特性分析

正式收集資料是以南投縣家暴中心自民國89年1月至民國92年6月底所受理的家庭暴力通報案件為母群體。在這段期間，南投縣家暴中心共受理3275件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其中之實際開案數為2468件)，扣除非婚姻暴力或兒童虐待案件及資料不全、資格不合(沒有孩子、孩子年齡不符)、重複開案的名單等，以及不可抗拒之因素後(包括聯絡住址及電話變更、訪視未遇、找不到住址等因素)，取得466戶樣本數。經聯繫後，共取得208戶有效樣本(共416位，即208名父母及其208名子女)的同意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訪視成功率為45%。

參與正式問卷調查之成人受訪者共有208位(表二)，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98.6%)，只有3位是男性。成人受訪者之結婚(同居)年數以「16-20」年居多，佔27.4%，其次為「11-15」年，佔23.1%；其婚姻狀況則以「同住」居多，佔67.8%，其次是「離婚」，佔19.7%。成人受訪者之子女數以3人居多，佔41.8%，其次為2人，佔34.6%。成人受訪者之經濟來源主要以「自己工作賺錢」為主，佔67.3%，其次為「配偶提供」佔18.3%；在經濟狀況上，「勉強可維持生活」佔45.2%，其次為「非常需要資助」佔27.4%。此外，半數(52.4%)受訪對象之家庭型態為核心家庭，1/4是單親家庭(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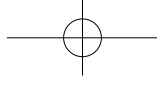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參與正式問卷調查之子女亦有208名，男女約各半，其年齡以11-15歲最多，佔38.4%；其次為10歲以下，佔27.9%，多數為國小學生，佔41.3%，其次為國中學生與高中學生(分別佔22.6%、22.1%)。半數的受訪子女在家中排行老大(51.9%)，其次為排行最小者，佔26.9%。



4. 受訪者通報資料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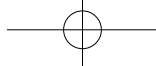
表二：受訪者人口變項之次數與百分比分配表

變項		次 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	1.4
	女	205	98.6
	總和	208	100.0
結婚年數	5年以下	7	3.4
	6-10年	45	21.6
	11-15年	48	23.1
	16-20年	57	27.4
	20年以上	41	19.7
	遺漏值	10	4.8
	總和	208	100.0
目前和伴侶的狀況	同住	141	67.8
	已分居	22	10.6
	已離婚	41	19.7
	其他	4	1.9
	總和	208	100.0
孩子數目	一人	10	4.8
	二人	72	34.6
	三人	87	41.8
	四人以上	38	18.3
	遺漏值	1	0.5
	總和	208	100.0
主要經濟來源	自己工作賺錢	140	67.3
	自己以前的積蓄	4	1.9
	配偶提供	38	18.3
	子女提供	6	2.9
	兄弟姊妹提供	1	0.5
	父母提供	3	1.4
	其他	16	7.7
	總和	208	100.0



經濟狀況	非常需要資助	57	27.4
	勉強可維持生活	94	45.2
	生活費用恰好夠用	48	23.1
	綽綽有餘，不需擔心	7	3.4
	遺漏值	2	1.0
	總和	208	100.0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	109	52.4
	折衷家庭	32	15.4
	大家庭	9	4.3
	單親家庭	51	24.5
	繼親家庭	2	1.0
	其他	5	2.4
	總和	208	100.0
子女年齡	10歲以下	58	27.9
	11-15歲	80	38.4
	16-20歲	52	25.0
	21歲以上	18	8.7
	總和	208	100.0
子女性別	男	95	45.7
	女	113	54.3
	總和	208	100.0
子女教育程度	幼稚園	10	4.8
	國小學生	86	41.3
	國中學生	47	22.6
	高中學生	46	22.1
	大專院校	19	9.1
	總和	208	100.0
子女家中排行	老大	108	51.9
	中間	38	18.3
	最小	56	26.9
	獨子	6	2.9
	總和	208	100.0

註：陰影的部分代表百分比最高的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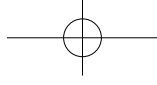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本研究從通報單中收集四個變項的資料，包括通報類型、有無開案、是否有子女目睹家庭暴力、以及是否有子女遭受家庭暴力(表三)。參與本研究之208個家庭中，在通報後社會局有開案的佔八成(78.4%)；且絕大多數的通報類型為「婚姻暴力」(92.3%)。在目睹兒童的部分，有填寫此問項的專業人員只有72.1%，其中有目睹與沒有目睹兒童的比例接近(分別是33.2%與38.9%)，另有高達2成(21.6%)的通報單上沒有目睹兒童的問項。此外，1成左右(11.1%)的通報紀錄顯示當時有兒童遭受到傷害；亦有高達3成(32.2%)的通報單上沒有關於兒童是否遭受傷害的問項。

表三：受訪者通報資料

變項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有無開案	有	163	78.4
	無	45	21.6
	總和	208	100.0
通報類型	婚姻暴力	192	92.3
	兒童虐待	4	1.9
	其他	2	1.0
	總和	198	95.2
	遺漏值	10	4.8
是否通報有目睹兒童	有	69	33.2
	無	81	38.9
	無此問項	45	21.6
	無填答此項	3	1.4
	總和	198	95.2
	遺漏值	10	4.8
是否通報有遭受傷害的兒童	有	23	11.1
	無	108	51.9
	無此問項	67	32.2
	總和	198	95.2
	遺漏值	10	4.8

註：陰影的部分代表百分比最高的選項



(三) 測量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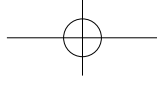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本研究運用問卷作為資料收集的測量工具。問卷分成父母版以及子女版兩種版本，分別由一位父母及其一位子女填答。問卷內容主要是以封閉式的題項為主，以開放式的訪談大綱為輔。封閉式的題項共有四個部份，分別是基本資料、衝突策略量表婚暴版、衝突策略量表兒虐版、與衝突模式。本研究檢閱國內外文獻初步完成問卷之設計與翻譯後，送請四位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的檢驗，並根據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修改以形成預試問卷。預試問卷中之衝突策略量表的信度介於.83與.95之間，顯示翻譯的衝突策略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信度。經過預試之後，增加與修改某些題項，再形成正式收集資料的問卷。本文之資料分析係來自於問卷中的基本資料、衝突策略量表婚暴版、與衝突策略量表兒虐版三個部份，其測量內容說明如下(基本資料的題項請見表二)：

1. 衝突策略量表婚暴版

衝突策略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s, 簡稱CTS)最早由Straus學者在1979年發表，其目的在測量人們使用特定策略(例如某種暴力的行為)以解決衝突的程度，迄今約有20個國家、400篇的研究報告是以CTS作為收集資料的工具，(Straus, Hamby, Boney-McCoy, & Sugarman, 1996)。許多國內的研究者亦曾使用CTS作為測量工具(例如：陳若璋，1992；曾慶玲、周麗端，1999)。由於CTS是國內外家暴研究最常使用的標準化量表，且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以及初步的建構效度與區辨效度(Straus, Hamby, Boney-McCoy, & Sugarman, 1996)，故本研究採用此量表以期研究結果能夠做跨文化的比較分析。

Straus et al.等學者(1996)在1996年發表新的量表版本(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簡稱為CTS2。CTS2共有39題，分成五個分量表，包括：

- (1) 協調(Negotiation， $\alpha = .86$)、
- (2) 精神暴力(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lpha = .79$)、
- (3) 肢體暴力(Physical assault， $\alpha = .86$)、
- (4) 性脅迫(Sexual coercion， $\alpha = .87$)、
- (5) 受傷程度(Injury， $\alpha =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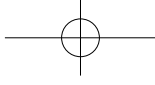
除了協調分量表以外，每一個分量表的題項又可歸為輕度(minor)與嚴重(severe)暴力兩種程度。由於量表每一題又可分成「我對配偶…」以及「配偶對我…」，故實際的施測量表題數共有78題。此外，本研究在作專家效度時，學者建議將量表中的「配偶用刀子或拿槍威脅我」一題，分開詢問，變成：「配偶用刀子威脅我」，以及「配偶拿槍威脅我」，故在本研究中，此量表題數共有80題。CTS2的選項採八點式Likert量表(0=從未發生、1=過去一年曾發生過一次、2=過去一年曾發生過兩次、3=過去一年曾發生過3-5次、4=過去一年曾發生過6-10次、5=過去一年曾發生過11-20次、6=過去一年曾發生過20次以上、7=過去一年沒有發生但以前曾經發生過)。

2. 衝突策略量表兒虐版

CTS2亦可用來測量父母對兒童的不當對待，其版本稱之為CTSPC(Straus, Hamby, Finkelhor, Moore, & Runyan, 1998)。CTSPC共有22題，分成三個分量表，包括：無暴力的管教(Nonviolent discipline, $\alpha = .70$)、精神暴力(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lpha = .60$)、與肢體暴力(Physical assault, $\alpha = .55$)。肢體暴力分量表又依嚴重性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輕度暴力(minor assault)、嚴重暴力(severe assault)、與極度嚴重暴力(very severe assault)。CTSPC另有一個補充量表(稱為疏忽量表，共五題， $\alpha = .22$)以及有關性虐待的題項(共四題)。本研究將CTSPC及其疏忽量表與性虐待題項皆納入問卷之中。

在信度方面，CTSPC肢體暴力分量表的信度較低可能是因為題項之間的相關係數較低，以及各個題項的次數分配呈現非常偏態的曲線分配(因多數人回答沒有遭受任何肢體暴力)(Straus, Hamby, Finkelhor, Moore, & Runyan, 1998)。量表研發者認為肢體暴力分量表題項之間的相關係數較低是可以理解的，父母可能慣用某種體罰方式，例如對孩子拳打腳踢，卻不一定會用刀子威脅孩子，因此不同的肢體暴力方式之間，不一定會呈現高度的相關。

由於量表每一題又可分成「爸爸對我…」以及「媽媽對我…」，故實際的施測量表題數共有54題(22題加5題疏忽題共27題)。再加上將前述的「爸媽用刀子或拿槍威脅我」一題分開詢問，故在本研究中，此量表題數共有56題，其選項及計分方式與CTS2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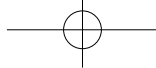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正式問卷的信度分析顯示(表四)，CTS2與CTSPC皆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由父母所填答的CTS2與CTSPC，其總量表的alpha 分別為.95與.93，分量表的alpha 則是介於.56(疏忽分量表)與.92之間。由子女所填答的CTS2與CTSPC，其總量表的alpha 分別是.96與.93，分量表的alpha則是介於.49(疏忽分量表)與.93。疏忽分量表的信度雖然較低，但與量表原研發者所研究出的信度相較($\alpha = .22$, Straus, Hamby, Finkelhor, Moore, & Runyan, 1998)，已高出許多。

(四) 資料收集與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預試的期間為民國九十二年一月至二月；正式收集資料的期間為民國九十二年五月至十月。

在案家面訪的部份，本研究運用社工研究所以及大學部高年級、修習過相關課程之學生人力作為訪問者，並對其進行訪員訓練。資料收集的程序則是先郵寄明信片給研究對象，說明有一項「行政院國科會補助的家庭相關議題的研究計畫」欲邀請對方參與研究。在明信片中留有訪員的聯絡電話，說明若對方不願意參與，可聯繫訪員回絕。在這個階段，有許多的明信片因查無此地址或查無此人被退件。也有許多受訪者主動聯繫詢問研究細節，並表達是否有參與研究的意願。若有意願，訪員則親至受訪者指定的地點進行資料收集。多數的受訪者選擇在家中受訪。如果案家音訊全無，訪員則嘗試以電話聯繫；若無電話，則按地址拜訪。訪視未遇三次則視為無效樣本。為避免引起同住者的疑慮，在電話聯繫時，如果不是本人接電話，訪員皆表示是一項研究案要邀請受訪者參與，並未透露研究的主題。

問卷填答的程序則是先向受訪者解釋研究的目的、面訪進行方式、並告知有拒絕與中途退出研究的權利，再向受訪者確保資料的保密性以降低作答的疑慮。最後再請受訪者瀏覽問卷，並簽同意書，表示其自願參與此研究計劃。受訪者自行填答問卷完畢之後，再由訪員依據訪談大綱進行深入訪談。若有小孩表示不會自行填答問卷，則由訪員逐題唸給小孩聽，再勾選小孩回答的選項。如果子女已超過18歲，則請子女受訪者回想、並根據18歲以前的家庭情況來作答。面訪時，以兩位訪員為一組，一人負責訪問父親或母親，另一人負責訪問子女。進行面訪時，兩組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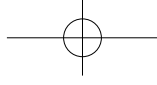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表四：衝突策略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父母版	α	α	兒童版
CTSPC(兒虐)	.93	.93	CTSPC(兒虐)
我的衝突解決方式	.88	.87	媽媽的衝突解決方式
無暴力	.64	.60	無暴力
精神暴力	.68	.65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	.79	.82	肢體暴力
疏忽	.56	.49	疏忽
配偶的衝突解決方式	.91	.88	爸爸的衝突解決方式
無暴力	.62	.62	無暴力
精神暴力	.76	.72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	.86	.83	肢體暴力
疏忽	.70	.60	疏忽
CTS2(婚暴)	.95	.96	CTS2(婚暴)
我對配偶的衝突解決方式	.90	.92	媽媽對爸爸的衝突解決方式
協調	.80	.86	協調
精神暴力	.72	.77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	.83	.88	肢體暴力
傷害程度	.83	.77	傷害程度
性脅迫	.72		
配偶對我的衝突解決方式	.92	.93	爸爸對媽媽的衝突解決方式
協調	.77	.84	協調
精神暴力	.83	.82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	.90	.92	肢體暴力
傷害程度	.67	.73	傷害程度
性脅迫	.83		

盡量在不同角落或空間作答，以免互相干擾或討論，影響作答的情緒或答案的真實性。訪談完成後，成人受訪者及其子女皆獲贈一份小禮物與一本家暴資源手冊以感謝他們的參與。

此外，本研究採取下列保護措施以避免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遭受二度傷害或其他危險：(1)取得同意；(2)資料保密；(3)確保安全：若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有身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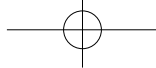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全的顧慮或危險時，由訪員主動轉介至南投縣家暴中心作後續的處遇或轉介。有部份的受訪者在詳讀問卷內容之後，表示不願意再回想起家暴相關事宜，或是不願意小孩涉入而婉拒參與本研究。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立場，訪員皆會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與退出研究的權利而立即終止研究調查的進行。如果剛好遇到施暴者在家或回家，訪員則詢問受訪者是否可以繼續進行問卷填寫或訪談，並尊重受訪者的決定。如果受訪者決定要繼續，則請其配偶暫時待在另一個空間(例如房間)直到訪談完成，受訪者的配偶通常會配合。如果訪員主動評估當時情境並不適合再繼續，則主動建議受訪者停止受訪。在所有208戶的面訪過程中，並無發生任何的衝突意外事件。由於南投縣幅員遼闊，且包含原住民部落，資料收集過程非常艱辛，光交通往返時間往往就要一兩小時。通報名單雖多，但實際能接洽到的受訪者並不多，最後能完成208戶的訪查，全靠訪員的努力不懈與受訪家庭的參與。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將以三個層面來呈現統計分析的結果。首先分析研究樣本的受暴嚴重程度；再者探討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最後則是檢定婚暴與兒虐關連性的研究假設。

(一) 婚暴與兒虐的嚴重程度

本研究根據受訪者對衝突策略量表的回答選項，採用各選項的組中點來計算每一種暴力行為發生的次數，以了解受訪家庭成員受各種類型暴力的發生率與嚴重性。衝突策略量表各個選項的組中點分別是：選項1與2(分別代表1次與2次)的組中點亦是1與2；選項3(3-5次)的組中點是4；選項4(6-10次)的組中點是8；選項5(11-20次)的組中點是15；選項6(20次以上)則算為25。因此，每一個題項依組中點重新計算之後的分數代表的是此一暴力行為在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次數；亦可以計算出整體受訪者在每一個題項與每一個分量表的平均次數(Straus et al., 1996)。表五與表六呈現的分別是受訪成人及其子女遭受各種類型暴力的發生率與一年內發生次數的平均數。發生率(prevalence rate)指的是在所有受訪者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曾經受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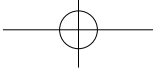


種類型的暴力；一年內發生次數(year chronicity)的平均數指的是在過去一年內，曾受到某種類型暴力的受訪者之受暴平均次數。如表五顯示，73.4%(共152位)的成人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曾經遭受到配偶的精神暴力，其遭受精神暴力的平均次數是35.5次。在肢體暴力的部份，63.3%的成人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曾經遭受到肢體暴力，平均次數是38.1次。此外，超過半數(54.9%)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遭受到配偶的嚴重肢體暴力，平均次數高達18.9次，幾乎每三個星期就會遭受一次嚴重的婚姻肢體暴力。此外，有14.6%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因婚暴而受到嚴重的身體傷害(見表五最後一列的數據)。至於受暴類型以精神暴力的發生率最高，其次是肢體暴力。

在兒虐的部份，表六分別顯示父親與母親對受訪子女的暴力傷害發生率與嚴重程度。就發生率而言，子女受到母親暴力行為的百分比皆稍微高於父親，只有在極度嚴重肢體暴力與疏忽的部份是父親高於母親。但在一年內發生次數平均數的部份則是父親施暴的次數高於母親。至於兒虐受暴類型和婚暴的類型相似，亦是以精神暴力的發生率最高，其次是肢體暴力。整體而言，受訪子女在過去一年內，約有六成遭受父母親的精神暴力(父母的平均數是58.2%)；約有五成遭受父母親的肢體暴力

表五：成人受訪者遭受配偶各類型暴力的發生率與嚴重程度(n=208位受訪成人)

變項	有效 樣本數	一年內發生率 %(人數)		曾經發生率 %(人數)		一年內發生次數 平均數
精神暴力	207	73.4	(152)	88.4	(183)	35.5
輕度	207	69.1	(143)	86.5	(179)	24.5
嚴重	206	54.4	(112)	73.3	(151)	16.0
肢體暴力	207	63.3	(131)	82.6	(171)	38.1
輕度	207	58.9	(122)	78.7	(163)	23.4
嚴重	206	54.9	(113)	74.8	(154)	18.9
性脅迫	207	39.1	(81)	52.7	(109)	19.2
輕度	207	35.3	(73)	47.3	(98)	12.3
嚴重	206	22.3	(46)	32.0	(66)	14.2
傷害程度	207	25.6	(53)	33.8	(70)	5.5
輕度	207	20.8	(43)	28.5	(59)	3.7
嚴重	206	14.6	(30)	19.4	(40)	4.4



表六：子女遭受父母親各類型暴力的發生率與嚴重程度(n = 208位受訪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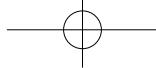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變項		有效 樣本數	一年內發生率 % (人數)	曾經發生率 % (人數)	一年內發生次 數平均數
父親	精神暴力	208	54.3 (113)	63.9 (133)	13.2
	肢體暴力	208	45.7 (95)	62.0 (129)	17.2
	輕度暴力	208	38.9 (81)	55.3 (115)	10.0
	嚴重暴力	208	31.7 (66)	44.7 (93)	8.2
	極度嚴重暴力	208	19.7 (41)	26.0 (54)	6.9
	疏忽	208	38.9 (81)	52.4 (109)	13.4
母親	精神暴力	208	62.0 (129)	71.6 (149)	11.0
	肢體暴力	208	50.5 (105)	66.8 (139)	13.2
	輕度暴力	208	43.7 (91)	59.1 (123)	10.1
	嚴重暴力	208	32.7 (68)	47.1 (98)	4.7
	極度嚴重暴力	208	16.8 (35)	23.1 (48)	4.2
	疏忽	208	38.0 (79)	50.5 (105)	11.5

(父母的平均數是48.1%)；二成遭受父母親的嚴重肢體暴力(父母的平均數是18.3%)；約有四成被父母親疏忽(父母的平均數是38.5%)。研究結果顯示出被通報家暴的家庭中，至少有半數的子女遭受到父母親的精神或肢體暴力傷害。

(二) 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

本研究分別檢視「一年內」以及「曾經」發生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合併發生率(表七)。研究結果顯示，被通報的家庭中，在過去一年內，有65.2%的家庭曾發生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的情形(全部傷害形式)；39.6%的家庭同時有夫妻與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若將暴力形式限定為嚴重的肢體暴力，仍有超過1/4(26.2%)的家庭曾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

若將時間點拉長到「曾經發生過」，則有高達84.1%的家庭曾發生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的情形(全部傷害形式)；63.8%的家庭同時有夫妻與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即使將暴力形式限定為嚴重的肢體暴力，仍有將近半數(48.1.2%)的家庭曾發生嚴重肢體暴力的婚暴併兒虐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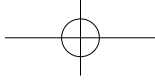
表七：當事人版本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n = 207戶)

	全部傷害形式		肢體暴力		嚴重肢體暴力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過去一年內	65.2	(135)	39.6	(82)	26.2	(54)
曾經發生過	84.1	(174)	63.8	(132)	48.1	(99)

表八：不同樣本所呈現之一年內婚暴併兒虐發生率之差異：父母vs.子女vs.當事人

家庭情況	全部傷害形式					
	父母版		子女版		當事人版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無暴力*	5.8	(12)	14.9	(31)	7.2	(15)
僅有婚暴	6.8	(14)	7.7	(16)	15.5	(32)
僅有兒虐	13.5	(28)	8.7	(18)	12.1	(25)
婚暴併兒虐	73.9	(153)	68.8	(143)	65.2	(135)
總和	100.0	(207)	100.0	(208)	100.0	(207)
遺漏值		(1)		(0)		(1)
家庭情況	肢體暴力					
	父母版		子女版		當事人版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無暴力*	11.6	(24)	26.9	(56)	16.9	(35)
僅有婚暴	13.0	(27)	15.4	(32)	25.6	(53)
僅有兒虐	23.2	(48)	13.5	(28)	17.9	(37)
婚暴併兒虐	52.2	(108)	44.2	(92)	39.6	(82)
總和	100.0	(207)	100.0	(208)	100.0	(207)
遺漏值		(1)		(0)		(1)
家庭情況	嚴重肢體暴力					
	父母版		子女版		當事人版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無暴力*	26.2	(54)	34.1	(71)	24.3	(50)
僅有婚暴	15.0	(31)	18.8	(39)	29.1	(60)
僅有兒虐	18.4	(38)	15.9	(33)	20.4	(42)
婚暴併兒虐	40.3	(83)	31.3	(65)	26.2	(54)
總和	100.0	(206)	100.0	(208)	100.0	(206)
遺漏值		(2)		(0)		(2)

* 所呈現的是一年內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此處出現的無暴力指的是過去一年內無婚暴且無兒虐事件發生，但在一年以前「曾經發生過」婚暴或兒虐的家庭。



本研究在計算有無婚暴或是兒虐情形時，是以當事人的回答為主，亦即在婚暴的部份是採計成人受訪者的說法；而在兒虐的部份是採計子女受訪者的說法。但因父母與子女皆同時填答有關婚暴與兒虐的題項，故亦可以從父母或是子女的回答去計算婚暴併兒虐發生率。從不同樣本所呈現之一年內婚暴併兒虐發生率之差異(表八)，我們發現依子女資料所計算出的發生率較父母低，顯示子女可能會隱匿或無法完全得知婚暴的情形。而本研究所採用的當事人版本的發生率是最保守謹慎的數據，其百分比皆低於父母版與子女版。

(三) 婚暴與兒虐的關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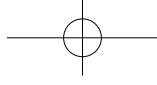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本研究進一步以卡方獨立性檢定(The χ^2 tes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variables)來考驗研究假設：「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有顯著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表九)，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關係達到顯著($\chi^2=6.2$, $p=.013$)，在有婚暴的家庭中，有兒虐的比例(80.8%)明顯地高於無兒虐的比例(19.2%)，代表兩者之間並非獨立事件。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成立。

如同文獻檢閱所述，不同計算期程、暴力類型與研究樣本，會使得婚暴併兒虐發生率的數據有高低之差異。然而本研究發現，不論是一年內或是曾經、不論是各式暴力或是肢體暴力、不論是父母或是子女的回答，上述的研究結果已突顯出國內亦有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存在同一家庭的現象，以及兩者之間的顯著關係。

表九：卡方檢定：婚暴與兒虐的觀察值與百分比交叉表(過去一年內的全部傷害形式；當事人版)

兒童虐待	婚姻暴力		總和
	否	是	
否	37.5% (15)	19.2% (32)	22.7 % (47)
是	62.5% (25)	80.8% (135)	77.3% (160)
總和	100.0% (40)	100.0% (167)	100.0% (207)

$\chi^2=6.2$, $p=.013$



五、討論與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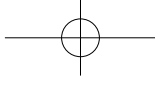
(一) 婚暴併兒虐發生率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及其關連性。研究結果顯示，一年內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合併發生率高達65.2%，另有超過1/4的家庭(26.2%)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此外，「曾經發生過」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更是高達84.1%；並且有將近半數的家庭曾發生嚴重肢體暴力的婚暴併兒虐的情形。本研究結果與Kruttschnitt & Dornfeld (1992)所得的結論最為一致，亦即限定在一年之內的合併發生率約在60%至70%之間；若是算曾經發生過，則百分比可高達80%以上。可能是因為兩份研究報告皆將一年內與曾經發生過的數據分開計算，且兩者研究的樣本皆為臨床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故結果也就比較相似。

若與通報單的資料相比，通報紀錄顯示只有1成左右的家庭有兒童遭受到傷害，而本研究卻發現至少有26.2%的兒童受到極度嚴重的肢體虐待，且其父母之間亦有嚴重的肢體暴力發生，是通報紀錄所呈現數據的2.5倍以上。因此，官方通報數據所呈現的兒童受虐問題的嚴重性，可能遠少於實際的受害兒童人數，其結果可能使得家暴保護系統錯失可以介入兒虐、協助保護兒童的關鍵時機。

至於在肢體暴力的部分，由父母版的回答所計算出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為52.2% (見表六肢體暴力父母版的數據)，非常接近黃志中(1999)以遭身體虐待的門診婦女之臨床調查結果所發現的58.8%。其可能的原因為，遭受肢體暴力的受虐婦女(相對於遭受精神虐待)比較可能尋求醫療的診斷與治療，故兩者的樣本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此外，林淑娥(2000)所統計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數據較低，但因其未說明婚暴與兒虐的定義為何，故較難與本研究的結果作比較。與沈瓊桃(2005)所統計的台北市社區樣本婚暴併兒虐(只採計肢體暴力)發生率(12.7%)相比，本研究發現通報樣本的肢體暴力合併發生率(39.6%) 超過社區樣本發生率的三倍，顯示被通報的家庭中，有許多的家庭存在著雙重暴力，而非只有被通報的單一暴力類型而已。

此外，如同文獻檢閱所述，資料來源會影響發生率數據的差異。本研究結果發現，依子女資料所計算出的家庭暴力發生率較父母低，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孩子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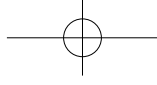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完全得知父母間的婚暴情形(例如孩子年紀太小不記得)，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孩子袒護父母親，害怕父母親離開家庭或遭受傷害。Kruttschnitt & Dornfeld (1992)的研究亦發現，與成人的自我報告相比，小孩至少短報20%的家庭暴力現象。因此，第一線的家暴相關人員(例如社政、警政、與醫護人員)在接觸疑似家暴個案時，對小孩的問答要謹慎，應多方觀察兒童是否受虐的指標(例如身上是否有傷痕)，才不會因小孩的害怕否認，錯失保護兒童的第一時機，進而發生兒童受虐致死的悲劇。

(二) 婚暴與兒虐的關連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婚暴與兒虐的關係達到顯著，在婚暴家庭中，有兒虐的比例明顯地高於無兒虐的比例。由此推論，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議題並非兩條平行線，不論在政策面、學術界或是實務界，皆不適宜將兩者分開檢驗與處遇。若將研究焦點只放在單一暴力類型，可能無法對暴力問題有整體性的了解；若家暴防治與保護系統只從單一暴力或問題介入，可能會產生服務不協調甚至衝突的困境(Beeman, Hagemester, & Edleson, 1999；林淑娥，2000；馬宗潔、鍾宜利，2003)。對於雙重暴力家庭，若是能以家庭整體的需求與安全為考量，將有助於終止暴力在家庭中的擴散。

許多婚暴在婚姻初期、平均結婚五年之內就已發生(劉秀娟譯，1998)。而子女從母親懷孕開始，即可能在母親腹中受到家暴的傷害與影響(Holden, 2003:152)。例如有一縱貫性的研究顯示(McGuigan & Pratt, 2001)，嬰兒在出生後六個月內，如果嬰兒母親受到婚暴，則此嬰兒在五歲之內受到肢體虐待、精神虐待、與疏忽的機率是沒有婚暴家庭的2-3倍。年幼的子女在婚暴情境中容易受到過度驚嚇或遭父母遷怒，因而可能嚴重受虐，甚至受虐致死(Lehmann & Rabenstein, 2002; 童伊迪、沈瓊桃，2005)。因此，實務工作者應將家中有年幼子女的婚暴家庭列為優先積極處遇介入的對象，以捍衛兒童的生存權與成長權。

此外，本研究發現，被通報家暴的家庭中，子女受到父親與母親暴力對待的發生率頗為接近。此研究結果顯示，子女除了可能受到婚暴加害者(例如父親)的暴力傷害之外，亦可能受到婚暴受害者(例如母親)的暴力對待。國外的研究亦顯示，受虐母親成為兒虐加害者的比率，至少是一般未受虐母親的兩倍(Straus, Gelles, & Smith,



1990)。另外，兒虐的加害者多數是母親(可能是因為母親是兒童的主要照顧者)，不過，在受傷嚴重甚至致死的兒虐個案中，父親是主要的加害者(Appel & Holden, 1998; Edleson, 1999)。因此，實務工作除了要保護子女免於婚暴加害者的傷害之外，還要評估母親是否有將受虐情緒遷怒於小孩，或將小孩作為報復工具的現象，並提供母親必要的情緒支持與親職教育。

(三)研究意涵：學術與實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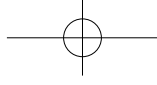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茲將本研究在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方面的貢獻、應用與建議，分述如下：

1. 在學術研究方面：

本研究以較大規模的實證資料檢視南投縣家暴通報樣本的婚暴併兒虐發生率，並以推論統計的實證研究結果，支持婚暴與兒虐兩者間的關連性，突顯出婚暴與兒虐極有可能存在於同一家庭的現象。此研究成果除了可與西方的婚暴併兒虐文獻做進一步的比較之外，亦是國內極少數以家庭為中心來檢視家庭內部不同類型暴力的同步存在性的研究。在未來研究的部分，建議學者在探討發生率或相關議題時，務必清楚說明其研究方法(包括家暴定義、期程、測量工具、與研究對象等)，才能比較各項數據的異同。

2. 在實務工作方面：

本研究發現婚暴與兒虐的合併發生率極高。即使是將家庭暴力的定義限定為嚴重的肢體暴力，仍有超過1/4的家庭在過去一年內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也就是說，家暴中心所受理之家庭暴力通報事件之中，每四個有兒少子女的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在過去一年內有嚴重肢體暴力之婚暴併兒虐的現象，極需實務工作者的介入與協助保護。美國目前已有婦保與兒保的機構在作整合性方案的嘗試與努力，且有初步的成果。例如，研究顯示(Magen, Conroy, Hess, Panciera, & Simon, 2001)，兒保機構在調查兒虐案件時，若能同時使用婚暴的問卷調查，則受虐婦女被發現的數目可增加到100%。基於婚暴與兒虐有顯著關連性的研究發現，家暴防治與保護相關單位在服務相關家庭時，應積極發展服務整合的模式，全面性地考量家中所有成員的安全與福祉，共同攜手為家庭裡所有的受害者提供最



安全與有效的保護服務。

至於在通報單的設計與填寫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高達3成的通報單上沒有關於兒童是否遭受傷害的問項。因此，本作者強烈建議在各縣市或各通報機構的家暴事件通報單的設計上，一律加問有關婚暴與兒虐的題項，以及在後續的評量與服務提供的部分，亦能例行性與結構性地關注與評量家庭是否有雙重暴力的議題，才能治本並把握發掘問題與保護受害家庭成員的關鍵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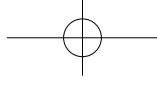
雖然本研究有其貢獻與重要性，但在做推論時，仍需注意到本研究之限制。由於本研究之對象為單一縣市的家暴通報樣本，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全國的一般家庭。此外，可能由於研究主題的敏感性與造成二度傷害的可能性，降低家庭參與研究的意願，致使訪問成功率只有五成左右。故本研究結果最能代表的是居住在鄉村型的縣市中，可聯絡上、且有意願參與研究之家庭暴力通報家庭。

(四) 結論

本研究以南投縣家暴中心所受理之208個通報家庭為研究對象，並以標準化的測量工具來探討婚暴併兒虐的發生率及其關連性。研究結果充分顯示出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顯著關係及其在家中合併存在的現象。目前國外針對婚暴併兒虐的研究已有初步的成果；而國內的相關研究與實務工作才剛開始，需要急起直追，才能了解台灣雙重暴力家庭的特質，並將家中所有的受害成員整合於家暴服務的安全保護傘之下，以降低因家庭暴力所造成的個人傷害、家庭悲劇、與社會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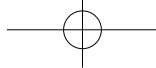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謝 詞

本文根據國科會所補助之專題研究計劃中部分研究發現撰寫(計劃名稱：「婚暴合併兒虐家庭之相關研究」；計劃編號：NSC 91-2412-H-260-002 & NSC 92-2412-H-260-001)。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另感謝南投縣政府家暴中心李佩凱督導與研究助理的大力協助(童伊迪、李碧琪、蘇研如、許惠媛、鄧之恆)。最後要感謝所有鼓起勇氣參與此研究的家庭成員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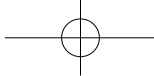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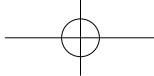
- 丁雁琪(1999)：〈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處遇之困境〉。《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處遇研討會》。高雄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 沈慶鴻(2001)：〈被遺忘的受害者—談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影響和介入策略〉。《社區發展季刊》，94期，頁241-250。
- 沈瓊桃(2005)：〈兒童知覺的雙重家庭暴力經驗與其適應行為之相關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8卷，1期，頁25-64。
- 周月清(1996)：《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林淑娥(2000)：《誰的最佳利益—母親或兒童？初探台北市婚姻暴力合併兒少虐待家庭的社工處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馬宗潔、鍾宜利(2003)：〈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衝突：以婦女保護工作和兒童保護工作為例〉。《社會工作實踐及評估學刊》，2期，頁30-49。
- 翁毓秀、莊靜宜(2003)：〈目睹兒童與受暴母親之親子關係研究〉。《二十一世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醫療福利學術研討會》。頁165-180。台中：靜宜大學。
- 陳怡如(2003)：《婚姻暴力目睹兒童處遇工作之初探——一個體制外的觀察與反省》。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若璋(1992)：〈台灣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婦女與兩性月刊》，3期，頁117-147。
- 曾慶玲、周麗端(1999)：〈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問題行為影響研究〉。《家政教育學報》，2期，頁66-89。
- 黃志中(1999)：《以家庭為導向的家庭暴力防治策略》。高雄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婚姻暴力合併兒童虐待處遇」研討會。
- 黃富源、黃翠紋(2000)：〈婚姻暴力對於兒童、青少年行為影響及其防處策略之探討〉。《警學叢刊》，30卷，4期，頁239-261。
- 童伊迪、沈瓊桃(2005)：〈婚姻暴力目睹兒童之因應探討〉。《台大社會工作學刊》，11期，頁129-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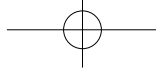
- 劉秀娟譯(1998)：《家庭暴力》。台北市：揚智。(譯自：Gelles, R. J., & Cornell, C. P. (1990).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Appel, A. E., & Holden, G. W. (1998). The co-occurrence of spouse and physical child abuse: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2(4), 578-599.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ndura, A. (1989).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R. Vasta (Ed.), *Annals of child development* (pp. 1-60).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Beeman, S. K., Hagemeister, A. K., & Edleson, J. L. (1999). Child protection and battered women's services: From conflict to collaboration. *Child Maltreatment*, 4(2), 116-126.
- Bowker, L. H., Arvitell, M., & McFerron, J. R. (198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fe beating and child abuse. In K. Yllo & M. Bograd (Ed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ife abuse* (pp. 158-174). Newbury Park, CA: Sage.
- Bronfenbrenner, U. (1989).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 R. Vasta (Ed.), *Annals of child development* (pp. 187-249).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Carlson, B. E. (1991). Outcomes of physical abuse and observation of marital violence among adolescents in place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6, 526-534.
- Carter, J. (1998).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use, and youth violence: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Fund.
<http://www.mincava.umn.edu/link/fvpf2.htm>
- Edleson, J. L. (1999). The overlap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woman batter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5(2), 134-154.
- Folsom, W. S., Christensen, M. L., Avery, L., & Moore, C. (2003). The co-occurrence of child abus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n issue of service delivery for social service professional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0(5), 375-387.
- Gelles, R. J., & Straus, M. A. (1988). *Intimate violence: The definitive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bus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Giles-Sims, J. (1985).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battered children of battered wives. *Family Relations*, 34, 205-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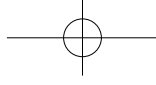
- Hilton, N. Z. (1992). Battered women's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 witnessing wife assaul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7, 77-86.
- Holden, G. W. (2003). Children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Terminology and Taxonomy.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6(3), 151-160.
- Holden, G. W., Stein, J., Ritchie, K., Harris, S., & Jouriles, E. N. (1998). The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beliefs of battered women. In G. W. Holden, R. Geffner, & E. N. Jouriles (Eds.), *Children exposed to marital violenc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ed issues* (pp. 289-33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otaling, G. T., Straus, M. A., & Lincoln, A. J. (1990). Intrafamily violence and crime and violence outside the family. In M. A. Straus & R. J. Gelles (Eds.),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pp. 431-466).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Hughes, H. M., Parkinson, D., & Vargo, M. (1989). Witnessing spouse abuse and experiencing physical abuse: A "double whammy"?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4, 197-209.
- Jouriles, E. N., Barling, J., & O'Leary, K. D. (1987). Predicting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in maritally violent familie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5, 165-173.
- Jouriles, E. N., & Norwood, W. D. (1995). Physical aggression toward boys and girls in families characterized by the battering of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9, 69-78.
- Kerr, M. E., & Bowen, M. (1988).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New York: W. Norton.
- Kruttschnitt, C., & Dornfeld, M. (1992). Will they tell? Assessing preadolescents' reports of family viol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9, 136-147.
- Lehmann, P., & Rabenstein, S. (2002). Children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The role of impact,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In A. R. Roberts (Ed.), *Handbook of domestic violenc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Policies, programs, and legal remedies* (pp. 343-36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gen, R. H., Conroy, K., Hess, P. C., Panciera, A., & Simon, B. L. (2001). Identify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6(6), 580-601.



- Markowitz, F. E. (2001). Attitudes and family violence: Linking intergenera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6(2), 205-218.
- McCloskey, L. A. (1997). *The "Medea syndrome" among men: The instrumental abuse of children to hurt wive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 McGee, R. A., Wolfe, D. A., Yuen, S. A., Wilson, S. K., & Carnochan, J. (1995). The measurement of maltreatment: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Child Abuse & Neglect*, 19(2), 233-249.
- McGuigan, W. M., & Pratt, C. C. (2001). The predictive impact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three typ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Child Abuse & Neglect*, 25, 869-883.
- McKibben, L., De Vos, E., & Newberger, E. H. (1989). Victimization of mothers of abused children: A controlled study. *Pediatrics*, 84, 531-535.
- Minuchin, S. (1985). Familie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rovocations from the field of family therapy. *Child Development*, 56, 289-302.
- Moore, J. G. (1975). Yo-yo children—Victims of matrimonial violence. *Child Welfare*, 8, 557-566.
- Moore, T. E., & Pepler, D. J. (1998). Correlates of adjustment in children at risk. In G. W. Holden, R. Geffner, & E. N. Jouriles (Eds.), *Children exposed to marital violenc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ed issues* (pp. 157-22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O'Keefe, M. (1995). Predictors of child abuse in martially violent famili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0, 3-25.
- Senate Hearing 101-939. (1990).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Washington, DC: Author.
- Silvern, L., Karyl, J., Waelde, L., Hodges, W. F., Starek, J., Heidt, E., & Min, K. (1995). Retrospective reports of parental partner abuse: Relationships to depression, trauma symptoms, and self-este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0, 177-202.



- Simons, R. L., Wu, C., Johnson, C., & Conger, R. D. (1995). A test of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Criminology*, 33, 141-171.
- Stacey, W. A., & Shupe, A. (1983). *The family secret: Domestic violence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 Sternberg, K. J., Lamb, M. E., Greenbaum, C., Cicchetti, D., Dawud, S., Cortes, R. M., Krispin, O., & Lorey, F. (1993). Effect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nd depress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44-52.
- Straus, M. A., Gelles, R. J., & Smith, C. (1990).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Risk factors and adaptations to violence in 8,145 famil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traus, M. A., Gelles, R. J., & Steinmetz, S. K.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traus, M. A., Hamby, S. L., Boney-McCoy, S., & Sugarman, D. B. (1996). 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2):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dat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7(3), 283-316.
- Straus, M. A., Hamby, S. L., Finkelhor, D., Moore, D. W., & Runyan, D. (1998).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data for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 par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2(4), 249-270.
- Suh, E. K., & Abel, E. M. (1990). The impact of spousal violence on the children of the abused. *Journal of Independent Social Work*, 4, 27-34.
- Swinford, S. P., DeMaris, A., Cernkovich, S. A., & Giordano, P. C. (2000). Harsh physical discipline in childhood and violence in later romantic involvem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blem behavio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 508-519.
- Walker, L. E. (1984).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New York: Springer.
- Wildin, S. R., Williamson, W. D., & Wilson, G. S. (1991).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Developmental and learning profiles. *Clinical Pediatrics*, 30, 299-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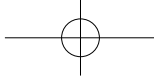
The Co-Occurrence Rate of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A Case Study of Nantou County

APRIL CHIUNG-TAO SHEN

Purpose: Societal responses to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have developed along separate tracks for a long time. These two issues were often studied and intervened by separate researchers,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However, Western empirical stud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ave provided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occur in the same families. In contrast,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research reports concerning the co-occurrence of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occurrence rat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professional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Methods: The research design of this study was cross-sectional and quantitative.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from 208 families (including 208 adults and 208 children) who were reported incidents of family violence to official agencies. The questionnaire had two versions, answered by one parent and one child in each family. The CTS2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 including 80 scale items) and CTSPC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 including 56 scale items) were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lpha of the CTS2 and CTSPC were .95 and .93 (parent's version) respectively; the alpha of the child's version were .96 and .93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good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s. A pilot stud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during January and February of the year 2003. The formal data collection took place from May to October in 2003. In term of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ult participant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females (98.6%).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adult participants (47.1%) had been married for at least 16 years. A large percentage (67.8%) of the participants lived with their spouses and had three children (41.8%). In terms of the children participants, 41.3% of the children wer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gender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children was even.

Results: Chi-square analysis showed that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chi^2=6.2$, $p=.013$), which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The co-occurrence rate had been 65.2% for the past year (including all types of violence). 39.6% of the families had experienced physical violence both between spouses an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addition, approximately 1/4 of the families had experienced severe physical violence both between spouses an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 “ever” co-occurrence rate was 84.1%, and approximately 1/2 of the families had at some time experienced severe physical violence. In addition, comparing the co-occurrence rate reported b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tended to underreport the occurrence of family violence compared to their parents. In terms of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arital violence for adult participants, 73.4% of them had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violence 35.5 times on average during the past year; 63.3% of the adult participants had experienced physical violence 38.1 times on average during the past year. In terms of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hild maltreatment for children participants,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m had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violence from either their fathers or mothers during the past year.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between fathers and children were very similar to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for all kinds of violence.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ildren not only could be maltreated by their abusive father, but also by their abused mother.

Conclusion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and severity of the overlap between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The article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mitation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nd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s: family violence, marital violence, child maltreatment, the co-occurrence of marital violenc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April Chiung-Tao S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